

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

熊娟 著

上海古籍

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

熊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 / 熊娟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325-7514-5

I. ①汉… II. ①熊… III. ①汉语—佛经—语言学—研究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1266 号

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

熊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0,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978-7-5325-7514-5

H · 126 定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12YJC740121)资助成果

序

罗杰瑞曾经指出：“世界上很少语言像汉语那样含义广泛……当你要指的是某个时期的汉语时，这就会产生某种的不便，假如要避免歧义，你就得使用某种复杂的名称——古汉语、文言、中古汉语、早期白话……”^①这些名称关涉汉语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重构汉语史学必须要有正确的史学观。

“古汉语”是一个通行但又宽泛的概念。“如果求名实相副，所指应该是‘古代汉民族的语言’。这几个字牵涉的问题很多，因为‘古代’的下限难定（上限只能到有文献可考），‘汉民族’的内容太杂（尤其商周时代）。 ”^②通行的观点，汉语以“五四”为断限划分古代和现代，“古汉语”这个概念囊括了先秦至清末长达四千年的汉语历史。严格地说，“汉语”由汉族得名，其前身为“华夏语”，汉代以后各个时段，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不同的面貌。然而事实上，“直到不久以前，还是有许多人把‘古代汉语’当作一个单纯的东西来对待。”^③索绪尔强调了语言的共

① 罗杰瑞《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

② 张中行《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 页。

③ 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 页。

时研究(主要指当代)和历时研究的区别,因而具有深远影响,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指出(或者说强调)历时研究是由若干共时断面研究作为基础的;故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古汉语”应划分出远古、上古、中古、近代等几个阶段,而不是混沌一块。

按照王力先生的观点,“古代汉语……大致说来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①这段话从今天来看,要作一点修正:首先,根据语言的传播媒介功能,书面语和口语才是“两种可选择的‘平等的’语言表达系统”^②,而“文言”和“古白话”仅仅是汉语古代书面语的两个分支。其次,根据晚近的研究,“周代和周代以前所遗留下来的书面语,秦代至汉初的某些书面语,大致是和当时口语相近或相一致的,汉初以后,各时代文人的书面语仿照前人的词汇语法用法和行文格调,成为一种脱离当时口语的‘特殊书面语’”^③,这就是“文言”;而“从汉末魏晋以后到‘五四’前(权作这样划分),还有一种与口语基本一致的书面语,这就称为古白话。”^④因此,古白话语体,应该始自汉魏而成熟于唐五代。

客观地说,文言、白话和口语,同属一种语言,而非分属不同的语言。“三者都是传达文化的手段,并不能和社会上不同阶级的文化划等号。但实际上它们还是反映了中国各阶级文化思想

①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

② 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③ 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④ 同上。

上不同的强调方面。如果把读者画成三个同心圆,那么文言文学的读者群就是最中间的那个最小的圆圈,包围在它外面的那个较大的圆圈里是白话文学的读者群,最外面那个大得多的圆圈,则是口头文学的听众群。”^①因此,我们研究古代某个时段的语言时,不能不借助反映历代口语成分的有关文献,并以现代方言加以印证。

重构汉语史学更要有扎实的语料基础。

理想的语料最好能充分反映各个时期口语的状况,但“口语使用‘语音实体’,呈典型的空气压力运动形式”^②,“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有声语言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想保存,就不能不靠长寿的书面语言”^③,也即使用“图文”实体、以典型的表面标记为形式的书面语,这也就是古白话材料日益受到重视的原因。

罗杰瑞认为,研究早期白话(或者说反映口语程度高的文献)的资料主要有三种:

1. “宗教文献……传教士,由其工作性质所决定,在传教时都尽量用简单的、易于被人接受的语言来说明教义。所以,早在东汉时期,佛教文献(几乎包括所有的翻译,和对印度原文的解释)就具有强烈的白话味儿。这种白话性质,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宋代都是这样。”

2. “流行的诗歌和短篇故事的集子也是研究早期白话的重

① P·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② 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③ 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要资料。”

3. “保存有直接对话的文字段落,是研究早期白话的第三种重要资料,这种对话的记载,可以在列朝的正史实录、逸事趣闻及流行的传说故事中见到。”^①

徐时仪则认为,“列代记载当时实际语言而反映汉语白话发展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以下作品:

(1) 用口语体写的文学作品,如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宋元话本、金元时的诸宫调、元杂剧、明清白话小说等。

(2) 为某种特定需要而记载下来的当时口语的实录,如禅宗语录、理学家语录、外交谈判记录、司法文书、直讲体、会话书等。

(3) 散见于文言作品中的白话资料,如诗、词、曲中反映口语的语句或笔记史传和碑帖中反映口语的片断。”^②

罗氏所举,着眼于文献“反映口语程度高”这一点,长处是特标“宗教文献”,缺点是没有点明具体的文献资料。

徐氏所列,着眼于“较能反映当时口语面貌的古白话作品”,如“口语体写的文学作品”、“口语的实录”,并补充“散见于文言作品中的白话资料”,而且还特标“语录”,指向明确;问题是下文“择要略作介绍”的内容与上述分类不甚匹配,如:“汉译佛典”,由于“既非纯粹口语又非一般文言”,归不进上述三类;“宋儒语录”也是“文白混杂的半口语化的语言”,严格地说,也不能算“记载下来的当时口语的实录”;而其他交叉、混杂之处不少。

① 罗杰瑞《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② 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但两者异曲同工的是,罗氏将“宗教文献”列为第一,而徐氏择要列举介绍中将“汉译佛典”放在首位,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作为中土文献的重要补充,汉文佛典无疑是中古时期的重要语料。

利用汉文佛典语料研究古代汉语,大约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间大致为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70 年代,属于萌芽期;其时汉文佛典及其语言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学界还是以先秦两汉文言典籍及后世仿古写成的典籍为“正宗”。但是,国内外学者已尝试利用汉文佛典语料研究汉语史:如 20 世纪初,德国汉学家钢和泰(1877—1937)利用宋代法天的对音材料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拟测的隋代《切韵》音系相比照,撰写了《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1920 年法国汉学家马伯乐(1883—1945)利用天竺高僧不空的汉译梵咒材料研究汉语鼻声纽,发表《唐代长安方音》。1923 年汪荣宝师法钢和泰,根据梵汉对音拟测歌、戈韵的古音值,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成为国内利用梵汉对音材料研究古音韵第一人;1941 年吕叔湘利用禅宗语录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发表《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开利用佛典语料研究汉语历史语法的先河;1944—1948 年周一良相继发表《中国的梵文研究》和《论佛典翻译文学》,考释了“劫、刹那、魔、檀越”“仁、曼、缘、复次”等佛教语词,成为利用汉文佛典材料研究汉语历史词汇的先驱者。此外,先师蒋礼鸿先生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的对敦煌变文口语词汇的通释也较多地使用了汉文佛典材料,如一百卷的《法苑珠林》。但总体来说,相较此前以大量所谓“正宗”文言语料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只能算是对汉文佛典语料“举例”式的零星使用。

第二阶段,时间大致为 20 世纪的 70 年代末至世纪末,属于

“不自觉地”，对汉文佛典语料的使用呈“喷发”状态。“1970年代末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全面恢复，佛教文献语料在国内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重要的成果不断涌现。如俞敏、施向东、刘广和、尉迟治平和储泰松等的梵汉对音研究，项楚、刘坚、蒋绍愚、吴金华、董琨、江蓝生、曹广顺、颜洽茂、梁晓虹、袁宾、张联荣、俞理明、蔡镜浩、方一新、董志翘、李维琦、黄征、王云路和朱庆之等的汉语历史词汇和语法研究等，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佛典语料，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此外，张永言和汪维辉等的汉语常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更有赖于佛教文献的支持。”^①据帅志嵩、谭代龙等的不完全统计，1980—2006年正式发表的佛教汉语研究论著达300多篇(部)^②，这还不包括数量可观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此期对汉文佛典语料的价值取向一度呈“一边倒”的态势：囿于前辈学者对汉文佛典“喻俗”价值的认知，把佛典材料当作“完全口语的代表”，对佛典语料“无条件欢迎”，以至于发现汉文佛典中“那些不经见的语言成分和现象往往都被认为是口语和俗语的成分，进而希望在更早的文献中寻找来源”^③。如对汉文佛典中由于四字格文体影响而形成的大量临时组合产生误判，错误地认为佛典中“异常强烈的双音化现象完全就是口语的特征，或大抵是‘口语的倾向反映在书面语上的一种结果’”，造成了对中古时期汉语复音化认识的扩大化。事实上，佛典中的

① 朱庆之《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页。

② 帅志嵩、谭代龙等《佛教汉语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08—651页。

③ 朱庆之《代前言：佛教混合汉语初论》，《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页。

“高度双音化与当时汉语词汇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不完全是自然语言的反映，其中有较多的人为因素”^①。此外，不重视对汉文佛典语料的鉴别，轻信古代经录的题署，不加辨别径直“拿来就用”，如把《释摩男经》误作后汉支谶译经，把误题吴支谦译的《撰集百缘经》当作三国语料，“这在早期利用佛经者当中是屡见不鲜的”^②；如有学者认为动量词“过”的始出时间可以上推到东汉，其例证是题署为后汉安世高译的《舍利弗悔过经》和题署为后汉康孟详译的《兴起行经》，事实上《舍利弗悔过经》在《出三藏记集》中归于西晋竺法护译经，而《兴起行经》既非康孟详所译也非东汉译经，“最早也在三国，有可能晚到晋代”^③，立说的基础不牢靠，研究结论的正确性自然大打折扣。

第三阶段，时间大致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现在，属于“相对自觉期”，对汉文佛典语料的使用渐次追求“精准”。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对佛教文献语言的特殊性质逐渐有了深入的认识，朱庆之率先提出“佛教混合汉语”的概念，他认为“要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正确利用佛教汉语，必须先对这种语言本身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厘清‘两个混合’（指汉语与原典语言成分的混合、文言成分与口语成分的混合——引者注）的具体表现，尤其应当先把受到原典影响的部分切割开来”^④，而“随眠”、

① 朱庆之《论佛教对古代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影响》（上），《普门学报》2003 年第 15 期，第 28—29 页。

② 方一新《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54 页。

③ 卢巧琴《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8 页。

④ 朱庆之《语言接触及语言变异理论与佛教汉语研究》，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564—565 页。

“本二”、“粗恐”等仿译形式的揭示则是作者“切割”的具体实践^①。其次,对汉文佛典的语言学鉴别初露端倪,梁晓虹、遇笑容、曹广顺、史光辉、季琴、胡敕瑞、汪维辉、颜洽茂、熊娟等均有零星考证。其中较早的单篇论文有梁晓虹的《从语言上判断〈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遇笑容、曹广顺的《也从语言上看〈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的译者问题》和《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以〈旧杂譬喻经〉为例》;而研究专著当属卢巧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和方一新等的《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两书均归纳了语料鉴别的各种方法,提供了失译经、误题经(包括译人、翻译年代、翻译地点)鉴别的研究范例,方氏还提出了鉴别标准的选取原则。

由汉文佛典语料使用和鉴别引发的对疑伪经的语言学研究,前有梁晓虹的《从〈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看“伪疑经”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于淑健的《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导夫先路,后有熊娟即将梓行的《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应该说是大大拓展了汉语史研究和汉语史语料使用的领域。熊著颇多胜处,约略有以下数端:

1. 选题富有挑战性。疑伪经研究是佛经文献语言研究中的难点,一般人不敢轻易涉足。作者从语料角度切入,并将于淑健以考订录文、辨识俗字为主的敦煌遗经研究的“点”,拓展为包括已入《开元录·入藏录》的刻本疑伪经、未入《开元录·入藏录》并以写本保存的敦煌写经、日本古写经在内的整个疑伪经

^① 朱庆之《佛经翻译中的仿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262页。

“面”的语言学本体研究,为汉文佛典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有裨于汉语历史语料库的建设,选题极具学术意义。

2. 对疑伪经的态度正确,认识到位。对疑伪经不是一味地“鄙视和排斥”,而是努力发见其价值,把它视为具有较高语言学价值的中土撰述类佛典之一种,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文中胜论纷呈,如“汉语史研究需要充分占有语言材料,(为不被人诟病指摘)放弃这些语料,对语言研究是一种损失……可能导致所得出的结论与语言发展事实不相符合”;语料可靠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但“语料可靠还应包括鉴别后的‘可靠’,通过考辨鉴别,一些编撰者、编撰时代不确定的疑伪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靠’……重新取用这部分语料可以为汉语史研究、为揭示语言发展的实际面貌提供一批语言材料”;又“在鉴别疑伪经语料的过程中,把一个一个语言现象产生的时间或地域、通行时间或地域乃至消亡时间与地域都大致勾勒出来,即揭示它们的时代性、地域性,给一个一个语言现象建立起历史档案”,这种档案“模型”便可以成为鉴别“新”语料和验证“旧”语料的利器。

3. 本文上编综论,厘正疑伪经的定义,归纳疑伪经语料鉴别方法,揭示疑伪经语言特点,发凡起例;下编则为《净度三昧经》、《安宅神咒经》、《盂兰盆经》三部疑伪经的鉴别个案;上下编互为呼应,允为佳构。作者的语料鉴别以文献学为基础,以语言学为旨趣,同时借鉴宗教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使三者有机结合,相互证发,此外还辅以内容比勘、图表说明、统计分析,从而使结论坚确不拔。

4. 自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设《疑经录》后,历代经录对疑伪经的记载,其篇目、数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在王文

颜、张森的基础上,董理爬梳历代经录,删除重复,同时广泛吸收《七寺古逸经录研究丛书》、《藏外佛教文献》、《大正藏》85册等藏外典籍收录的疑伪经以及零星发现的写本疑伪经,钩稽补阙,厘定收入《入藏录》的现存疑伪经计30种108卷,未入藏的疑伪经共101种(其中9种仅见经名)139卷。

5. 作者考释语词并非简单就词释义,而是着重通过比较、分析、探源,解释构词理据、产生途径和方式,如“关下”与同类词语“颁下、宣下、敕下、告下”进行比较,分析“烟张”的来源可能受“鸱张、枭张”类推影响,用梵汉对译材料对“慎护”的语义进行辨析,推溯“盂兰盆”的语源语义而大胆提出古人“翻汉为梵”的设想……皆可圈可点,出色当行;它如“上件”之上述义,“厢”之边、旁义,“失睡”之睡着义,“伏连”之肺结核义……皆其例。

毋庸讳言,本书尚存在一些不足,如综论的理论归纳、内在贯通略嫌不足,个别章节的探讨、解释尚有拓展的空间,疑伪经研究在重构汉语史学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实例还有待进一步充实。鉴于汉文佛典疑伪经的语言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是不应该苛求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会越来越深入。

友生熊娟2005年入我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学期间,刻苦研读语言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基础课程,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同时积极参与导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资助项目,表现出良好的学术潜质,2010年顺利毕业。其时,适逢我受学校委派到贵州大学挂职,遂动员她支援西部高校,熊娟慨然允诺加盟贵州大学文学院;此

后,又推荐她申请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项目,获得成功后有幸赴东瀛从松江崇博士做了2年研究。令人欣慰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近年来她的学术发展势头良好,衷心期盼她在学术上做出更加骄人的业绩!

是为序。

颜洽茂

2014年10月于浙大紫金文苑

凡 例

一、全书采用简体字，汉文佛典（包括疑伪经）和中土文献引例中出现的异体字，基本按照现行标准简体字进行了统一。比如“鷄”、“龜”、“窓”、“底”、“觀”、“昏”、“羈”、“鎌”、“瓮”、“疎”等，都统一写作“鸡”、“粗”、“窗”、“底”、“睹”、“昏”、“羁”、“镰”、“盆”、“疏”等。

二、汉文佛典（包括疑伪经）引例除了少数随文标注出处之外（诸如《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藏外佛教文献》、《文史》、《疑经研究》等），其他都出自《大正新修大藏经》和《卍续藏》，引例有版本异文的，仅标注与主题词语或语意理解直接相关的异文，其他概不标注。

三、汉文佛典（包括疑伪经）的名称多以“佛说”开头，本书一概略去“佛说”二字，但在引介前贤时修的研究成果时，如果有“佛说”二字则予以保留。

四、因为疑伪经一般没有题署或仅有假托的题署，所以出自疑伪经的引例一般不标注其时代和编撰者，疑伪经之外的汉文佛典引例和中土文献引例除了上下文有明确交代的，其他都标注出时代和译（作）者或者交代“失译”，如果题署信息有误，则在时代和译（作）者之前加上“旧题”。不过，对诸如“十三经”、先秦诸子作品、《史记》、《汉书》、《三国志》、《魏书》、《世说新语》这

样普及性极高的中土文献,则不予标注时代和作者。

五、引例所出自的汉文佛典(包括疑伪经)和中土文献如果是一卷本,标注引例时在经名之后不言及卷数;如果有两卷或两卷以上,标注引例时在经名之后交代其所在卷数。

六、本书采用的敦煌遗书简称如下:“S”指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P”指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俄 Φ”指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遗书;“北”指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先冠以《敦煌劫余录》的编号,再用括号注出千字文编号。数字编号之后的“a\b\c……”表示某号写本包括几个不同的内容,数字编号之后的“v”指的是(某号写本的)背面。